

新视角下的 标准与国际贸易

田东文 编著



中国标准出版社

新视角下的 标准与国际贸易

田东文 编著

中国标准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视角下的标准与国际贸易/田东文编著.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66-5181-3

I. 新… II. 田… III. 国际贸易-标准-研究 IV.
F7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9163 号

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045

网址 www.spc.net.cn

电话：68523946 68517548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5 字数 243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一版 200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8533533

前　　言

伴随贸易自由化及全球范围内关税水平的不断降低,标准的实施效果变得更加清晰。频繁活跃的标准化活动表明,消费者需要更安全、更高品质的产品;随着技术创新与全球商务拓展,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及环境问题日益关注,标准在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判断一项标准完善与否的依据,是考察其能否达到两种功能间的均衡:纠正市场失灵而产生的正效应;执行成本及实施中可能产生的负的贸易与福利效应。同理,为实现成员方的贸易自由化安排与各方公共政策目标之间的适当平衡,WTO关于标准的多边规则需要协调标准实施中客观存在的一对矛盾:一国福利最大化常常并非意味着全球福利最大化。

作为市场准入主要手段的标准已成为现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占领国际市场的重要筹码。一国标准化机构必须足够灵活地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并不断提高其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程度。与标准回应能力相关的标准的分配效应为各国政府带来了许多挑战,在从战略性视角考虑关于标准的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并准确评估能力构建与制度安排的分配内涵。



本书建立了标准的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完整框架,分别从贸易影响、福利效应、贸易与福利效应综合考量的角度考察标准、标准协调与互认的经济效应;全面整合与评价了通过建模对标准进行数量分析的各种工具及方法;运用微观计量模型、局部均衡模型等,分别对标准的贸易及福利效应、与产品生产加工过程相关的环境标准的贸易及投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阐释了在协议不完备特征下WTO关于标准的多边安排;提出了中国内生标准体系的制度安排与能力构建的思路。

需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所指多边贸易规则、多边贸易安排、多边法律规范,除非另有说明,均指WTO体系相关协定及规则,不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间达成的双边或区域性协定。另外,由于标准的核心性作用,书中关于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的讨论均围绕标准展开。

本书可供从事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规则研究的学者、研究生,以及商务管理、实践机构的相关专业人员参考使用。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国家质检总局郭力生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杨昌举教授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家人亦给予我极大的精神支持和关爱,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8年10月28日

目 录

1	绪论	1
1.1	标准与国际贸易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1.2.1	国外研究状况	3
1.2.2	国内研究状况	7
1.3	研究方法及目标	10
2	标准与国际贸易中标准壁垒的形成机制	12
2.1	标准	12
2.1.1	概述	12
2.1.2	标准的分类	13
2.1.3	标准形成原因的经济学分析	16
2.1.4	标准的功能与消极作用	22
2.2	标准与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	23
2.2.1	标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23
2.2.2	标准与标准壁垒的关系	24
2.2.3	标准壁垒的识别	24
2.3	标准壁垒的形成机制	25
2.3.1	标准壁垒形成的技术差异及需求差异分析	25
2.3.2	标准壁垒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6
2.3.3	标准壁垒形成的贸易保护动因分析	27
3	标准的贸易影响与福利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29
3.1	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9
3.1.1	兼容性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9
3.1.2	安全性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30
3.1.3	环境标准与贸易	31



3.1.4 标准壁垒的作用机制	32
3.2 遵从标准的成本与收益	32
3.2.1 遵从标准的成本	33
3.2.2 遵从标准的收益	35
3.2.3 遵从标准的成本与收益在各类主体间的差异	35
3.3 标准的贸易影响与福利效应	36
3.3.1 遵从标准的福利分配效应	36
3.3.2 标准的贸易影响与福利效应的综合分析	37
3.4 标准协调与互认的贸易影响与福利效应	39
3.4.1 产业内标准兼容的福利效应	39
3.4.2 国家间标准协调与互认的贸易影响与福利效应	40
3.4.3 与执行标准相关的合格评定程序的协调与互认的影响	42
3.4.4 国际层面标准协调的途径	42
3.5 理论分析结论	43
4 标准的贸易影响与福利效应的测度方法研究	45
4.1 标准的贸易影响与福利效应的实证研究方法及证据	45
4.1.1 调查法(survey-based approach)	45
4.1.2 计量分析方法	47
4.1.3 局部(部分)均衡法(partial equilibrium, PE)	49
4.1.4 可计算的一般(总体)均衡法(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52
4.2 研究目标的确定与测度方法的选择	52
4.2.1 研究目标决定的测度方法选择	52
4.2.2 构建分析框架的思路	53
4.3 实证研究方法的评价与归类	53
4.3.1 研究方法评价	53
4.3.2 各种方法的比较与归类	56
4.3.3 各种研究方法的应用前景	57
5 标准的贸易流量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59
5.1 标准与国际贸易流量	59
5.1.1 国家标准与协调标准	59
5.1.2 标准的协调与互认	60
5.2 引力模型的早期研究及近期发展	61

5.2.1 引力模型的早期研究	62
5.2.2 贸易引力模型研究的近期发展	62
5.2.3 引力模型的两个问题	64
5.2.4 国内学者对引力模型的应用情况	64
5.3 引力模型对包含中国数据样本的适用性检验	65
5.3.1 “国家对”的构建	65
5.3.2 模型与数据说明	65
5.3.3 实证研究结论	67
5.4 国际标准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67
5.4.1 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因素的引力模型检验	68
5.4.2 实证研究结论	71
5.5 SPS 措施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农产品贸易流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71
5.5.1 农产品 SPS 措施分析	71
5.5.2 SPS 措施的实施与农产品贸易流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75
6 标准福利效应的局部均衡分析	84
6.1 出口商遵从标准的成本估计	84
6.1.1 识别决定损失的关键因素	84
6.1.2 出口商遵从成本的上限估计	86
6.1.3 估计方法的局限性	89
6.2 中日大豆贸易中农残限量标准的福利效应分析	89
6.2.1 中日大豆贸易	89
6.2.2 中日大豆贸易的局部均衡模型	90
6.2.3 日本福利效应的变化估计	93
6.2.4 中国福利效应的变化估计	95
6.2.5 实证分析小结	97
6.3 中欧花生贸易中黄曲霉毒素含量标准的福利效应分析	97
6.3.1 世界及中国花生贸易现状	97
6.3.2 黄曲霉毒素含量标准对中欧双方的福利影响	98
6.3.3 实证分析小结	106
7 环境标准的假说在中国的检验	107
7.1 环境标准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107



7.1.1 环境标准的两个假说	107
7.1.2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经验证据	107
7.1.3 关于环境竞次或规制弱化假说的经验证据	108
7.2 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及其产业污染现状	108
7.2.1 在华 FDI 的地区及产业分布状况	108
7.2.2 对华 FDI 投资主体的特点	109
7.3 环境标准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华转移的区位决定影响分析 ..	110
7.3.1 研究方法及思路	110
7.3.2 污染密集型产业 FDI 在华投资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	112
7.3.3 结论与分析	115
7.4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检验	116
7.4.1 检验方法比较	116
7.4.2 样本的选择及依据	117
7.4.3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依据	118
7.4.4 解释变量的确定	118
7.4.5 模型构造及数据结构	121
7.4.6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122
7.5 结论及政策启示	123
8 标准的多边贸易安排的制度分析	124
8.1 协议不完备特征下的 WTO 标准规则	124
8.1.1 WTO 协议关于标准的多边安排	124
8.1.2 WTO 标准规则的协议不完备特征	127
8.2 WTO 标准规则协议不完备性的救济方法	127
8.2.1 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不完备协议的救济	128
8.2.2 非歧视原则对于不完备协议的救济	128
8.3 与标准相关的 WTO 争端中两种救济方法的适用	129
8.3.1 关于标准必要性的“平衡”检验	129
8.3.2 关于标准及其实施中的“一致性”要求	129
8.3.3 关于标准的科学依据	130
8.3.4 关于生产加工标准	132
8.3.5 关于标准协调	133
8.4 两种救济方法协同作用下 WTO 标准规则的完备化	133
8.4.1 平衡与福利最大化	134
8.4.2 科学依据与消费者偏好	134



9

8.4.3 标准协调与国际标准的作用	185
8.4.4 多边贸易体系中生产加工标准的实施	185
9.1 中国现有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完善目标	136
9.1.1 现有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	136
9.1.2 中国标准体系完善的目标	137
9.2 中国标准体系的能力构建	137
9.2.1 国内层面能力构建效果的多目标综合评价	138
9.2.2 国际层面能力构建的效果与实践	139
9.2.3 影响能力构建效果的因素	142
9.2.4 以国际标准化为导向的能力构建	144
9.3 中国标准体系的制度完善	144
9.3.1 标准体系完善的多边贸易规则约束	144
9.3.2 标准体系完善的政策目标约束	145
9.3.3 标准制定主体的多元化	147
9.3.4 标准体系完善过程融入国际标准化体系	148
9.4 结论	148
参考文献	150

1

绪 论

1.1 标准与国际贸易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世事难料,标准化的初衷是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得简单,然而事与愿违,事情反而更加复杂化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标准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日益加强。随着单边及多边贸易自由化使得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关税水平得以降低,标准的实施效果变得更加清晰。日益增长的标准化活动反映出消费者对安全、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技术创新、与经济全球化需要标准在技术上不断更新与协调,许多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使标准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标准在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然而,标准可成为一种隐蔽的保护手段。即使其出发点并非保护主义,但标准设计与适用的不当可在很大程度上对贸易伙伴带来歧视性结果。在关税保护水平降低、多边贸易规则限制着成员方政府任意提高关税水平并使用数量限制措施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尝试使用其他限制进口的手段就不足为奇了。标准本身的双重特点使其具有成为核心性贸易保护措施的属性:一方面能够不断促进产品质量、技术水平的提高及认证制度的形成,为贸易进一步便利化提供途径;另一方面融合了价格控制和数量控制两种机制,对国际贸易构成一定障碍,是“伴随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壁垒综合化和复杂化的一个典型形态”(冯宗宪,柯大钢,2001)。标准成为贸易壁垒源于其外部性特征,新标准的制定实施可能产生新的贸易障碍。标准的作用已从主要满足传统产业中产品的通用互换,逐渐发展成为新兴产业中现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取得竞争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的关键手段。

WTO 意识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滥用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消极影响,为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并保证各国维护国家或区域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 协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 协定)等规则,对各国制定、实施标准的条件、过程进行了规定。通过 TBT 协定附件 3 要求各国家标准制定部门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以现有或即将出版的国际标准为参考,以减少由于各国规则或标准的不同对国际贸易造成的阻碍。同时,WTO 与 ISO、IEC 等国际标准化组织进行积极合作,鼓励所有的成员方标准化机构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促进标准的调和,在 ISO、IEC 等相关的国际标准化机构制定国际标准时提供尽可能广泛的资源。截至 2004 年 11 月 4 日,共有 110 个国家和区域性组织的 151 个标准化机构通报接受 WTO-TBT 附件 3。

2005 年世界贸易报告(WTR 2005)序言指出:“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稳定、相互支持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系职能得以有效发挥具有重要作用。标准是纠正诸如不完全信息、负的外部性(环境恶化)等市场失灵的基本手段。标准同时对技术兼容性(系统外部性)市场良性



功能的形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标准的设计与实施必须同时避免滥用,或在这些方面俘获公共政策,从而对竞争和贸易构成无端的阻碍。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标准的协调是否必要;标准应当是自愿性的还是强制性的;标准的制定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一种公共行为或个人行为;生产过程及产品标准是否应当成为国际义务主体;谁来负责确保生产商和销售商遵从已有标准。这些问题大多没有简单的答案。必须权衡利弊,预期的结果常常因环境不同而异,并非所有政府持有相同的公共政策偏好。WTO 面临的特有挑战是,确保做好各种可能的事情,便于发展中国家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有效参与。这一点在标准领域与其他领域同样重要。应对这些挑战须保证发展中国家拥有为达到标准要求,并形成其自身标准体系所必备的基础设施,保证他们在合格评定程序中不至处于不利地位,保证他们能够有效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活动。尽管在这些领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标准国际化是否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预期的积极影响,WTO 要求各国标准化组织参与 ISO、IEC 标准制定能否达到减少贸易阻碍的效果,虽然大多数学者对于结果持有积极的态度,但相关的实证研究仍然缺乏,况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是否可以促进本国产品技术水平提高,并借此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认可程度,达到扩大本国出口的目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标准体系的能力构建与制度安排。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持续、高速、超预期增长。2001 年进出口总额约 5 100 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2002 年猛增 20%以上,达 6 200 亿,实增 1 100 亿。2003 年全年增长 37%,进出口总额达 8 512 亿美元,净增 2 300 多亿,比 2002 年翻了一番,仅进口增加数就等于上年全年进出口增长总和。对比该年全球贸易 1 万亿的增加,2003 年中国新增进口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出口增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 11.7%,居世界第一。中国全球贸易排名进入第四位,进口则位居第三。2004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 11 547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7%;出口共计 5 934 亿美元,增长 35.4%,进口共计 5 614 亿美元,增长 36%;全年贸易顺差 320 亿美元,比上年扩大 65 亿美元。2005 年对外贸易继 2004 年首次突破 1 万亿美元后,2005 年更是达到 14 221.2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3.2%,相当于“十五”时期初 2001 年的 2.8 倍,其中出口 7 620 亿美元,增长 28.4%;进口 6 601.2 亿美元,增长 17.6%。2002 年初讨论《2000 年—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时,提出进出口额至 2010 年再翻一番,达到一万美元的中长期规划目标已提前六年实现¹⁾。中国无疑已是一个贸易大国,但要成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目前来看,阻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和技术水平差距的客观存在,出口产品面对世界各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许多出口产品对各类国际标准不适应,往往在新标准、环保标准、设备标准面前止步。产品出口面临的标准已从针对产品本身性能、质量标准,发展到产品生产、包装、运输的全过程标准,有些具有普遍性,有些针对中国特定产品而设,使得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难度增加,出口竞争力受到极大影响。同时由于我国技术性法规体系尚待完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及预警机制正在建设,业界了解不多,缺乏统一协调,近年来国外不符合发达国家技术法规与标准要求的产品或污染密集型产品大量涌入我国市场,对我国国家安全、民众的生命健康及生态环境构成了直接危

1) 数据来源:商务部官方网站,<http://www.mofcom.gov.cn>。

害。长远来看,WTO 成员方之间标准的相互协调将有助于推动成员方制定和实施合法、合理 的标准,加速中国企业产品及技术的创新,促进中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但短期内则对中国商品出口构成一定的冲击和不利影响。不可否认,当前众多国际贸易产品标准的背后的确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对此应该冷静、理性地看待,有些标准并非仅仅针对中国的出口商品,而是国际通用准则,具有普适性。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能适应或者不愿意去适应,结果只有自己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甚至退出国际市场。从本质上讲,标准有助于淘汰落后生产方式。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广大企业既然要在全球采购和生产的国际大循环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就要主动适应国际标准及进口国标准,不断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对中国而言,亟须进行标准的理论研究,分析当代国际贸易中标准实施、发展的现状;把握其内涵、外延及中性的本质;厘清其产生及约束机制;评价标准的贸易影响程度,及其对进出口国的分配及福利效应。利用研究结果建立有效的政策措施,引导帮助国内企业正视国外标准,在出口中有效识别标准壁垒、适时采取措施跨越壁垒保证出口增长,或运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贸易利益;同时在多边贸易规则约束下,配合国内产业政策发展目标,选择制定合理的标准,构建中性、合理的内生标准体系,对政府调控和规范市场的能力构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国际化发展、防范贸易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受连续不断的规则需求的驱动,工业化国家的产品及加工标准迅速增多且不断演化,这些变化是对消费者关注产品质量的反应,亦是对与风险及安全性相关的经济成本评价的科学手段发展的反应,已引起许多学术文献的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随着标准不断被创造、实施,日益成为新的保护手段的客观现实而逐渐增多。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与标准相关问题的研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1.2.1 国外研究状况

1.2.1.1 综述

20世纪70年代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研究标准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量出现,并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大量探索。

1. 关于标准及其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分类

早期研究较多集中在概念内涵的澄清及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Baldwin(1970)认为,技术与管理法规通常与健康、安全或其他一些重要的公共利益有关,经常成为不必要的贸易障碍。国家间在安全或健康目标上的分歧构成对贸易不必要的扭曲,应当予以消除。Suzanne(1998)和 Varian(1992)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双刃性”,既具有矫正外部性“好”的一面,也具有保护国内生产者“坏”的一面。Roberts 等(2002)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定义为一系列社会规则,是国家采用的、能够实现健康、安全、质量、环境和其他经济目标的用于管制商品进入国内市场的规则和标准。标准具有校正由于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作用。Roy 和 Renner(1970)分析了标准化和产业化问题。Sykes(2000)研究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国际标准的多边合作、关贸总协定(GATT)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协调活动以及欧盟内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等,结论是:遵守 GATT 的



有关原则能够有效克服国家间法规与标准差异所产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但 GATT 管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效力还取决于执行的努力。需要更多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信息,尚不清楚其对各部门的重要性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响。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分类,Roberts, Josling 和 Order 等(2002)分别按照政策手段和政策实施目标,将其分为进口禁止、技术规范、信息矫正和风险降低措施与非风险降低措施几类。Marceau 等(2002)从 WTO 关于货物贸易国内规则的约束角度,对 WTO-TBT、WTO-SPS 以及 GATT 第 1、3、11、20 条等条款进行了保护性手段与非保护性手段的区分,结论是:相比原 GATT 对运用国内措施的规定,WTO-TBT 和 WTO-SPS 协定对于采用国际标准和促进标准融合提供了更强的激励。

2. 关于标准的贸易保护主义判定

Baldwin(1970)认为一个贸易管制措施如果降低了全球实际收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Engel(1996)认为如果这种措施不同于一个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 SP)的选择,这个措施就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Fischer 和 Serra(2000)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定义为:如果这种措施不同于当全部生产者都是本地的厂商时社会计划者将施加的措施时,则该措施就是贸易保护的。Maskus, Wilson 和 Otsuki(2000)提出了四条更为具体的判定贸易保护主义标准的原则。Fischer 与 Serra(2000)研究了标准的贸易保护效果,结论是政府制定的最低标准即使表面非歧视,也是贸易保护的。Gandal 与 Shy(2001)研究了政府是否承认外国标准的政策行为,结论是:当政府政策只限于承认所有外国标准或不承认任何外国标准时,如果网络外部性显著,所有国家会相互承认所有的标准。

3. 关于标准的贸易及福利效应的评估和测度

Fisher 等(1995)证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核心内容——法规和标准确实具有排挤国外厂商出口供给的作用。Paarburg 和 Lee(1998)运用庇古税对国际牛肉贸易中牛海绵状脑病外部性风险进行了货币化衡量,认为当风险或预期损失增加时,实际关税会变得很高。Thilmany 和 Barret(1997)量化了标准影响美国出口乳制品的等价关税效应和相应的福利变化。Calvin 和 Krissoff(1998)研究了检验检疫标准对日本进口美国苹果的等价关税效应和相应的福利影响。关于标准化、标准存量与国际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Swann 等(1996)和 Moenius(1999)研究了技术存量同贸易流量之间的关系。关于标准贸易影响的调查分析,经合组织 OECD(1999)对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 3 个产业 55 家公司进行了关于检验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贸易阻碍作用的调查。Henson 等(2000)就发展中国家遵从发达国家检验检疫要求增加的成本进行了调查。OECD1999 年调查收集了大量产业数据,用来分析标准的贸易成本,结论是:达到 OECD 成员国不同标准与技术法规要求的成本,加上测试与认证成本,占到全部生产成本的 2%~10%。关于标准对消费者的影响,Thilmany 和 Barrett(1997)认为,某些标准具有矫正市场失灵,避免挤出现象的积极作用,可促进贸易和消费。

Wilson 和 Otsuki(2004)研究了世界银行于 2004 年就 17 个发展中国家的 24 个产业的 689 个厂商所做的关于标准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一项调查发现:产品质量和高需求量的存在是提高出口能力的主要因素;70% 的出口厂商遭遇了强制性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影响,多数厂商察觉到技术法规对进入出口市场很重要,但实现这些要求有可能会减少出口;在主要出口市场中,欧盟的技术法规被广泛认为最重要,其次是美国;在国外技术性措施中,产品质量



标准被认为对出口成功最为重要,其次是操作标准和检测及认证要求;在产生遵从成本的厂商中,每种努力的附加成本通常占投资成本的 10%,在产生遵从成本的厂商中,最普遍的新增投入是对车间或设备的投资,另外还有重新设计产品和增加雇员;欧盟的合格评定应用最为广泛,厂商自身的合格检测通常较外包成本更高;在所有国际标准中 ISO 标准的运用最为广泛,多数厂商认为 ISO 标准是国内外市场成功销售的重要因素;互认协议在所有被调查的 17 个国家未普遍运用,东欧、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大多积极参与互认协议,多数厂商认为互认协议降低了成本。基于同一调查结果,Maskus, Otsuki 和 Wilson(2005)运用经济计量模型测度了发展中国家厂商为遵从主要进口国标准所增加的生产成本。研究发现,由于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增加,标准确实在短期内提高了生产成本。为遵从进口国标准,每提高 1% 的投资将增加 0.06%~0.13% 的可变成本,厂商遵从标准的固定成本平均约 42.5 万美元,或约占增加值的 4.7%。

4. 关于标准政策的政治决定

Suzanne(1998)在美国农业部 1996 年关于美国农产品面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调查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筛选出了影响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的若干经济和政治变量,并逐一做了解释和探讨。关于推行标准化的成本与市场竞争结构之间的关系,Fischer 和 Serra(2000)指出,由于标准化需要耗费成本,国内企业往往倾向于游说立法机关,在国内市场上采取低标准化战略来对抗国外企业的竞争。Casella(1996)研究产业标准联盟自发形成标准过程的观点则完全不同,其结论是:标准协调可以在产业层面形成,这一结论对于解释目前一些国家的现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如美国的标准制定已由传统的政府行为更多地转向由产业负责。Anderson, Damania 和 Jackson(2004)开发了一个代理游说模型,研究北美和欧盟在转基因食品上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结果表明,农民通过对政策制定者游说来影响标准的制定,消费者和环保主义者对标准的选择表示关心,来自国外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可能促使政策制定者产生提高标准的动机,而非降低标准。

5. 关于标准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一些学者、尤其是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特别关注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在单边、区域性及全球贸易中,越来越多的政府将技术法规及标准当做贸易政策的工具(Maskus 和 Wilson, 2001)。随着传统贸易壁垒的减少,这些非关税壁垒引起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关注,因为他们可能会承担比发达国家相对更高的成本。在国家层面上,由于制定自身标准比采用那些主要市场的标准成本更高,发展中国家多是“标准接受者”,而非“标准制定者”(Stephenson, 1997)。在厂商层面上,对主要出口市场诸如欧盟、美国、日本等不同标准的遵从会增加成本并限制出口竞争力。这些与国外标准和技术法规有关的成本可能由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承担,然而发展中国家既缺乏可供国内检测和认证的公共资源,又没有采取集体行动以提高自身标准的能力。结果是,为遵从标准所花费的成本中很大一部分由单个厂商自身承担。Stephenson(1997)从政策与制度层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标准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选择是采纳现有国际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的国际标准化指导原则,如果尚无国家标准,则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是采纳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标准,而不是制定其自己的本地标准。Wilson(1999)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 WTO 有关协议的执行及在出口方面受到的影响,结论是: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提



供技术上的援助。Chen, Otsuki 和 Wilson(2004)从出口倾向和市场分散化入手研究了满足国外标准对出口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标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倾向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过长的检测检验程序分别使出口减少了9%和3%;各国标准的不同导致出口商规模不经济,并且影响选择出口市场的决策,实证研究表明标准在一定情形下会阻碍出口商的市场准入,对出口到三个以上市场的出口商减少7%的出口可能性。此外,零配件外包的出口商由于对多重标准的遵从还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6. 关于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农产品出口增加与病虫害预防之间的权衡一直是政策争论的前沿问题。食品安全标准对仍旧依靠农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相互冲突的国家标准和未形成全球性统一食品标准的分化的(fragmented)体系中,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预期受到了严重限制。Moenius(2004)利用引力模型检验了欧洲主要国家间共享标准数量,以及各国单独实施的标准数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Krissoff 等(1997)分析了美国苹果出口商在日本、韩国和墨西哥市场面临的关税和标准壁垒,对三个出口市场分别建立了局部均衡模型,计算了进口国卫生检疫措施的等价关税,并据以计算出除关税外受卫生检疫措施影响的贸易量。Orden 等(1996)就美国对墨西哥水果——鳄梨(avocado)的进口禁令建立了美国鳄梨市场模型,分析由于进口引发病虫害对国内生产的影响,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与进口贸易有关的病虫害流行的可能性而采取的限制性标准所产生的福利损失,将超过病虫害流行本身引起的国内成本增加。Wilson 和 Otsuki(2001)为研究采用Codex国际标准对食品贸易的影响,就15个进口国(其中4个是发展中国家)的黄曲霉毒素标准对31个出口国(其中21个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对黄曲霉毒素中毒性最强的物质B₁采用Codex国际标准会使谷物和坚果的国家间贸易量在1998年的水平上增长61亿美元,采用Codex国际标准较各国家标准分歧情况下,世界总出口将增加388亿美元。Otsuki, Wilson 和 Sewadeh(2001)基于欧盟和非洲国家1989年~1998年的交易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对黄曲霉毒素标准变化对花生贸易的影响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欧盟的黄曲霉毒素标准每严格10%,其花生进口量就减少11%。新的欧盟黄曲霉毒素标准的实施将比采用Codex国际标准使贸易量降低63%。Wilson, Otsuki 和 Majumdar(2003)关于药物残留标准对牛肉贸易影响进行的调查发现,如果引入Codex国际标准,牛肉的国际贸易额增长将超过32亿美元,南非出口将增长1亿6000万美元,巴西将增长2亿美元,阿根廷增长超过3亿美元。Wilson 和 Otsuki(2004)调查了11个OECD进口国和19个出口国(包括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地)的贸易数据,研究表明,杀虫剂毒死蜱标准每严格10%,香蕉进口将减少14.8%;而且,由于与国际标准缺乏一致性,国家间杀虫剂残留的标准差异引致较高成本。Frahan(2004)利用一个结构性引力模型(structural gravity model)量化和检验欧盟食品标准协调增加其双边贸易的假设,结果表明,相比1998年食品标准未协调情况下,标准协调使双边出口增加了253%,食品标准差异的等价关税的估计值为73%~97%。

在农食产品领域大量私人安全与质量标准和技术法规同样普遍存在,尽管其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在事实上对供应商具有强制性(Henson 和 Northen, 1998)。私人食品安全与质量标准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供应链上主要企业,特别是大型食品零售商所面临

的规制和信誉风险的反应,同时也可服务于企业为满足日益多样的食品安全与质量要求而实施产品差异化竞争战略提供便利。在主要企业努力控制其与全球供应链相关的交易成本的条件下,私人食品安全与质量标准开始从主要以企业对企业要求的形式向集体标准演变。随着这些供应链跨越国界,私人标准已成为一种潜在的重要贸易问题(Henson, 2006)。这些私人标准随着消费者关注的变化而演变,已成为高附加值农食产品市场竞争力定位的手段(World Bank, 2005)。私人标准的演变反映出在国家及国家经济体系的治理中“软法”的优势,以及规则体系趋向于共同规制的创新。其结果是,私人标准而非公共标准正在成为推动农食产品贸易发展的支配力量。有证据表明,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发展完备的私人标准正迅速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遍及发展中国家农食产品市场。

1.2.1.2 评论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标准研究的证据表明,标准与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本可以检验某种类型的标准是否具有贸易创造的效应,但除了环境标准及 SPS 措施外,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不区分所研究标准的属性,并且可获得的有关标准对国际贸易流量影响的文献仍旧有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数据的选取与处理的困难。就已有结论而言,产业内贸易会由于产业部门标准制定活动的加强而增加,表明标准在不断扩大的兼容性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同样,即使是国家标准的采用,也可能增加贸易量,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标准向出口商传达了关于消费者偏好的信息。标准制定活动似乎在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产业中十分显著。大多数技术法规的作用都是处理各种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一些主要市场这些法规覆盖了进口的很大份额,对贸易具有潜在的不利影响。对于标准协调或互认在便利贸易问题上的孰优孰劣,由于实证研究数量有限,目前尚不能取得定论。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均集中在欧盟国家,但早期研究显示互认具有更强更显著的贸易促进效果。

调查证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出口商遵从标准面临很高的成本,而且遵从标准的成本与收益在各国与出口商间的不同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相关研究发现,SPS 措施的限制作用通常会引起进口国的福利损失。通过进口引入病虫害等预计产生的健康风险或损失必须格外高,才能证明进口国实施 SPS 措施的正当性。但问题是,如果管理部门无法对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可靠的估计,其风险厌恶程度可能会高于预期。关于 SPS 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影响结论也不一,由于卫生与植物检疫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拒绝进入出口市场,导致销售额与市场份额丧失;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通过采用更高标准,发展中国家能够提高其产品的全球市场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标准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研究较细致深入且理论和实证研究分界较清晰,许多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标准和技术法规已成为国际贸易政策争论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关于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采取国际标准后的贸易成本与收益等问题。然而,关于进口国在国际或单边交易框架内实施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此类实证研究成果缺乏;而且,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标准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标准问题,关于发展中国家标准体系的建立,以及遵从标准的成本收益评价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1.2.2 国内研究状况

近十多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标准问题,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学者